



清代學術
名著叢刊

[清]胡渭 著

鄒逸麟

整理

禹貢錐指

又作嶽大原至子岳陞
 南曰腸水北曰陽山
 橫流入河
 塹如字橋也
 壤無塊曰壤
 錯賦謂土也
 厭田惟中
 石入于河
 島夷皮服
 帶也
 又作嶽大原至子岳陞
 南曰腸水北曰陽山
 橫流入河
 塹如字橋也
 壤無塊曰壤
 錯賦謂土也
 厭田惟中
 石入于河
 島夷皮服
 帶也
 又作嶽大原至子岳陞
 南曰腸水北曰陽山
 橫流入河
 塹如字橋也
 壤無塊曰壤
 錯賦謂土也
 厭田惟中
 石入于河
 島夷皮服
 帶也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點校尚書卷第三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禹別九州 公其新歷國制列及九州周公履綠云黃帝分

禹之官外也 物其後反 隨山濬川 思傑反 其若女反

禹之官外也 物其後反 隨山濬川 思傑反 其若女反

禹之官外也 物其後反 隨山濬川 思傑反 其若女反

禹之官外也 物其後反 隨山濬川 思傑反 其若女反

禹之官外也 物其後反 隨山濬川 思傑反 其若女反

禹之官外也 物其後反 隨山濬川 思傑反 其若女反

禹之官外也 物其後反 隨山濬川 思傑反 其若女反

清代學術
名著叢刊

〔清〕胡渭 著
鄒逸麟 整理

禹貢錐指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禹貢錐指/[清]胡渭著;鄒逸麟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

(清代學術名著叢刊)

ISBN 7-5325-4410-9

I.禹... II.①胡...②鄒... III.①歷史地理-研究-中國②禹貢-研究-文集 IV.K928.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38069 號

清代學術名著叢刊

禹貢錐指

[清]胡渭著

鄒逸麟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9.25 插頁 5 字數 620,000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300

ISBN 7-5325-4410-9

K·863 定價:9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漢學師承記箋釋

廿二史考異

禹貢錐指

史通通釋

既修太原至于晉陽高平曰太原今在岳縣名在太行山單襄底績至于衡漳漳水在魏郡

田惟中田之高平肥廣九州之中為第五也中地反又如字如馬云土地有高下肥瘠既從大陸既之也巴可耕休也丁反既作之也巴可耕休也丁反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此上此

監本纂圖重言重意點校尚書卷第三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禹別九州

分其折界仍按列及九州周公職錄云堯帝受命國治受國割地布九州歷行其不來其流其

任土作貢

任其土地所有安其貢賦之

禹敷土

禹敷土隨山刊木

隨山刊木

隨山刊木

奠高山

奠高山大

奠高

奠高

奠高

奠高

奠高

奠高

前 言

尙書禹貢一篇，雖僅有一一九四字，但歷來被奉爲我國「古今地理志之祖」，（明艾南英禹貢圖注序）。它假託大禹治水以後的政治區劃，實際是一種地理區劃，將全國分爲九州，並分別記述了這九個區劃的山嶺、河流、薈澤、土壤、物產、貢賦以及交通道路等，此外，還繚列了我國主要山脈河流的走向和流經，中原地區以外五個不同層次區域與中央的關係等等，是我國最早一部科學價值很高的區域地理著作。因爲它是經書中的一篇，歷來研究者不下數十百家。除了鄭玄、馬融、王肅、孔穎達、蔡沈等一些著名經學家外，歷代注釋、疏證者不可勝數。對其中文字、名物、制度、地理的考訂，盈篇累牘，各有所見。到了清初澠澠乎成了一門專門之學。但不少論斷還是語說紛紜，莫衷一是。至康熙年間胡渭撰禹貢錐指，采擷衆說，援古證今，考辨縝密，一掃漢儒附會、宋儒變亂的舊習，斷以己見，實爲千年來研究禹貢的集大成著作。正如徐秉義序中所云：「其書考正孔傳、孔疏、宋元明諸家之說，主以班固地理志，參以山海經、水經注及郡縣志，摘其謬誤，辨其疑似，使後世讀經者，瞭然心目之間，其功於禹貢不細，至發明夏道，所陳大義十餘，尤足證明孔子無間之旨，非但區區稽考沿革，鈎覈異同，資滕口說而已。」當然，其中某些結論，以今天的學術水平來衡量，還存在不少偏頗和謬誤之處。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是學術研究的規律，原不足爲怪。如果我們以倒退三百

年時間來考察，錐指一書在馮貢研究上的成就較前人大大地進了一步，爲今天我們理解馮貢時代的地理面貌以及歷代的變遷，提供了極爲豐富的資料和重要的啓示，這一功績是抹煞不了的。

胡渭，原名渭生，字拙明，晚號東樵。浙江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隆慶戊辰進士，官廣東順德令，有政聲，文與歸有光齊名。祖子益，諸生。父公角，天啓甲子舉人。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年）六月，胡渭卽降生在這個世代科舉的家庭裏。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胡渭年十二，父歿。隨其母避亂山谷間，教以書，遂有志于學。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年十五，爲縣學生，專「攻制義，苦心鑽研，寒暑不輟」（胡會恩馮貢錐指紀恩）。希望在科舉上有所發展，無奈命運不佳，屢試不第。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年）他的從姪胡會恩以進士第二名及第，而他已過不惑之年，還是一個老秀才，「乃入太學，館益都相國府」，在大學士馮溥家中當一名西席（杭世駿胡東樵先生墓誌銘，見道古堂文集卷四十）。

康熙十七年正月，朝廷開博學鴻詞科，馮溥欲推荐胡渭應詔，渭堅辭不肯就。「羣公避嫌，以相國子師，莫敢先發；及見荐牘，無先生名，則又大驚。」從此絕意科舉，專窮經義（墓誌銘）。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科場上的失意，很可能是他以後潛心學術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因素。

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年）馮溥致仕歸里，遂又館於相國徐乾學府。在京師的幾年裏，與一時

名選朱彝尊、毛奇齡、吳任臣、閻若璩、李振裕、萬斯同、徐敬可等過從甚密，切磋學問，多有獲益。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徐乾學奉詔纂修大清一統志。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年）徐乾學歸里，朝廷許以書局自隨，遂開局於蘇州洞庭東山，繼續纂修一統志。仍延請胡渭、顧祖禹、黃儀、閻若璩、查慎行等人共參其事。這一年胡渭已經五十八歲了。

參與大清一統志的編修，為胡渭研究輿地之學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從那時起，他開始了禹貢的研究。當時朝廷同意徐乾學的要求，將「一時金匱石室之秘藏，職方圖冊之彙獻，不憚數千里，攜載以歸」（裘璉纂修書局同人題名私記，橫山文集卷七）。杭世駿墓誌銘云：「先生」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凡與禹貢山川疆域相涉者，隨手鈔集，與經文比次，以酈道元水經注其下；酈注所闕，凡古今載籍之言，苟有當于禹貢，必備錄之。」除了豐富的資料條件，還有一批同道學者，共相切磋。徐乘義禹貢錐指序云：「往予伯兄尚書奉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于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若璩及德清胡朏明，皆海內碩儒傑士，卓乎不羣，而同在伯兄之門，可謂盛矣。」錐指略例亦云：「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于地理之學，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夕羣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弘多，不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所錯解者，今猶可得而是正；其以為舊跡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罅漏，而牽率應酬，未遑排纂。」胡渭就在這樣的環境和條件下，開展了對禹貢的系統研究，他利用工作之便，查閱了大量歷代文獻，博采羣書，薈萃

衆說，對諸家歧異之說，力求取得統一的說法。同時還延伸到歷代山川陵谷變遷的研究，體大精深，蔚然可觀。惜乎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徐乾學因事落職，書局亦撤。同年顧祖禹卒于家。三十三年徐乾學亦謝世。老成凋零，摯友四散。胡渭也歸里養病，「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撮其機要，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春而成，釐二十卷，名曰禹貢錐指。」以莊子秋水篇，以管窺天，以錐指地，句名書，喻其所見甚小，蓋胡氏自謙之意。這一年是康熙三十六年，胡渭六十五歲。

書成之後，胡渭于康熙三十八年再度進京，以錐指就正于禮部尙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士昇，得到高度贊許，並爲之作序，認爲是傳世之作。四十一年手摹禹貢圖四十七幅附于後。同年錐指在吳門刻成。四十四年（一一〇五年）李振裕、查昇以錐指進呈玄燁。同年三月玄燁南巡，駐蹕蘇州。胡渭親自攜書呈獻，得到康熙的嘉獎，賜御書詩扇及扁額「耆年篤學」四字。胡渭以七十有三老翁得此殊榮，於是名聲大噪，傾倒士林。以後又有易圖明辨、洪範正論、大學翼真等著作刊行。康熙五十三年（一一七一年）卒于家，享年八十二歲。嘉慶杭州府志卷八本傳：「國朝浙江治經學者，鄞縣萬斯大、蕭山毛奇齡、嘉興徐嘉、秀水朱彝尊，核其撰述，渭爲稱首。」可見後人對他在學術上所做出的貢獻評價是很高的。

禹貢錐指題二十卷，其中卷十一導山分爲上下兩卷，卷十三導河並附論歷代流徙分爲卷十三上、卷十三中之上、中之下、下四卷，卷十四又分導漾、導江上下兩卷，另外書首附圖一卷，實共二十六卷。附圖四十七幅中有十六幅是明艾南英禹貢圖註的翻版，胡渭未加說明，似有掠美之嫌。

胡渭禹貢錐指一書，是集以往研究禹貢大成的著作，在禹貢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胡渭以後研究禹貢作品仍然不少，但大多沿襲胡注。近年劉起鈎先生有禹貢冀州、兗州地理叢考（刊見文史）等佳作，然就整體而言，目前尚無一本注釋禹貢的著作能够替代它。此外，胡渭在錐指中有不少從注釋禹貢而延伸對地理沿革以及歷代水利興衰、區域經濟開發的論述，發揚了晚明以來「經世致用」、「學務實效」的學術思想更是彌足珍貴。無可懷疑，禹貢錐指在我國學術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下擬從幾個方面闡述錐指的成就及其價值。

一、不囿于舊注經家的窠臼，將禹貢作爲一部完整的地理著作來研究。自漢唐以來下迄宋明時代，注釋禹貢者不下百數十家，然大多限于個別文字的訓詁，個別制度、名物、地名的考訂，目的是爲了解經，沒有將禹貢作爲一部完整的地理著作，進行全面的融會貫通的研究，更談不上聯繫作者當時的地理環境了。如孔穎達疏、蔡沈集傳皆立于學官，「僅以資科舉而已」（李振裕序），其他百家之說，或過于繁雜，或相互矛盾，折衷紛紜，莫衷一是，讀者祇見樹木，未見森林，均未將禹貢作爲反映一個時代地理面貌的名著呈獻給讀者。

胡渭在錐指中所做的工作已遠非限于一般集解的意義。第一，他匯集了前人研究禹貢的所有

成果，如偽孔傳、孔穎達疏以及宋明諸家之說，如易祓禹貢疆理廣記、程大昌禹貢論、傅寅禹貢集解、茅瑞徵禹貢匯疏等，此外，如蘇軾、曾旼、葉夢得、張九成、林之奇、夏僕、薛季宣、黃度、呂祖謙、王炎、吳澄、金履祥、王充耘、王樞、邵寶等注釋尚書諸家，於禹貢尤爲精覈，發前人所未發，故稱引特多（略例）。第二，他特別注意利用史記、河渠書、漢書地理志、水經、水經注以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等歷代地志、總志、河渠水利專著來印證禹貢的地理。例如漢書地理志述郡縣山川時提到禹貢的有三十五處，代表了西漢人對禹貢地理的理解。西漢距禹貢著作時代較近，其說當較後代猜謎式的考證可靠。再說古地名不落實在具體的地理位置上，是非難辨。胡渭強調以地理著作來考訂禹貢的做法，無疑是比較高明的。第三，胡渭除了歷代注疏、地理專著外，「凡古今載籍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這就將研究禹貢的資料作全方位的擴大，不僅限于禹貢本文的詮釋，而且通過禹貢的注釋，提供給讀者的是一部通古今之變的地理專著。第四，他利用工作之便，廣泛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孫承澤九州山川考、王士禛蜀道驛程記、顧炎武日知錄、朱鶴齡禹貢長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閻若璩四書釋地等，都是清初成書的一些名著，大大豐富了雜指論據，使其成爲反映當時最高的學術水平的地理著作。

二、在禹貢研究上的創見。他廣泛搜羅前人傳注，參驗故實，辨其異同，研精覃思，定其是非，故非可與一般解經者齊論。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採用了地理沿革的方法來研究禹貢。

禹貢九州各以山川方位來定州域。歷代注經家往往限于注出某山某水即今某山某水而止，失之籠統，後人據此難以形成一個具體的地域概念。胡渭在略例中說：「九州之疆界，爾雅、職方不同于禹貢，蓋殷、周之所損益也。故必備舉以相參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時國土之可考者，略見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戰國之所屬，然後分配秦漢以降之郡國，而要以杜氏通典爲準。蓋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雖有沿革，不甚相遠，故通典以後，直接當今輿地。」他釋某州方域先從夏商周三代爲何地說起，然後提春秋時州境內有哪些城邦國家，戰國時又爲何國領地，秦時地屬哪幾個郡，漢時爲某數州之地，唐時又屬哪幾個州郡，最後用「以今輿地言之」一句，總結爲清康熙年間包括哪些省、府、州，其中不免有落實得過分具體之弊，然而總的說來，這種界定是可信的。或問對戰國時代人們觀念中九州範圍的界定究竟有何意義。回答是肯定的。因爲禹貢九州雖然是人們觀念中的區劃，但並非任意劃分的，是與當時的自然區劃和經濟區劃有一定關係的，後代政區的劃分和命名都有參考禹貢九州的痕跡。這樣說來，禹貢九州的界定與研究秦漢以後政區的劃分，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又如對禹貢河流、湖澤的考釋，也不僅限注明即今某水或某地而已。而是用漢志、水經、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等書，注明其流經的諸縣或範圍。凡在清初已經撤廢的舊縣，還用雙行夾注，注明舊縣的今地（清時），這對後人研究禹貢時代的地理景觀是很有價值的。

唯其對禹貢研究所下的功夫遠過歷來諸家，因此在某些山川考證上判斷就勝前人一籌。如兗

州「九河既道」一句，歷來不少學者多釋爲大禹鑿大河下游分爲九支，分流入海，以息水患。胡渭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引用于欽齊乘的觀點，以爲「河至大陸趨海，勢大土平，自播爲九，禹因而疏之，非禹鑿之而爲九也。」又說：「然而求九河者，正不必尺寸皆合于禹之故道，亦不必取足於九。」至爲確論。「九」祇是約數，即多股分流的意思，與「九江」同。後人強定「九河」之名，未必爲大禹時實際情況。又如「雷夏既澤，灘沮會同」中灘沮二水的解釋，從鄭玄到唐宋總志都說二水源出雷澤西北平地，東流入澤。然而宋人曾攸尙書講義却創另說，他解釋灘爲汭水，沮爲睢水。明人韓汝節（邦奇）禹貢詳略（茅瑞徵禹貢匯疏引）則又以山東小清河當沮水，以章丘縣一流入小清河支流潔水爲灘水。王夫之因爾雅「水自河出爲灘」，說文「灘者，河灘水也」，遂以漢武帝時黃河決流瓠子河爲灘水，更屬荒誕。胡渭以古今地理變遷的事實，逐一加以駁正，確認當以唐宋總志所說爲是。有的方志因見曹州南有灘河，自東明縣流入，又東北入鄆城縣界，遂以此爲禹貢灘水。胡渭指出「此乃（五代）段凝決河之後，河水分流始有此名耳。禹時河由大陸，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灘。」他認爲由于五代北宋年間河水多次在這地區泛決，「曹、濮間二源適當其衝，爲河所陷，久之河去，而空竇淤塞，水不復出矣。」是黃河泛決淤塞了古代灘沮二水，致使後代難以尋覓。這種判斷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又如他判斷徐州貢道「浮于淮泗，達于河」的「河」，應從說文作「荷」。他又認爲豫州「榮、波既猪」的「波」，應從馬融、鄭康成本作「播」，顏師古、林之奇、蔡沈均以榮、波爲二水，都是錯誤的。他根據山海經、水經等歷代河渠、地志諸書來考訂禹貢某些地理問題所作出的判斷，往往勝于前人。這樣的例子

在錐指中很多，難以一一備述。

三、對歷代河流變遷、水利興衰的研究。錐指注釋禹貢某水，不僅指出即今某水而已，同時還將該水的歷代變遷和水利興衰作概括的闡述。如果將這些文字匯集起來，不啻是一部歷代河渠志，讀者不僅了解了禹貢時代的地理面貌，還可對戰國以後該水的歷代變遷、水利興衰以及在社會經濟方面的影響，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例如釋冀州「衡漳」，除指出「衡漳」即漳水外，還從戰國魏西門豹、史起開修漳水十二渠，「以富魏河內」講起，再記述曹魏、北朝、唐宋引漳灌溉工程的興衰更替，強調「漳水之爲利也大矣，然冬官不修，溝逆地防，水屬不理孫，則有害矣。」並指出明正德年間，漳水自安陽南決，「袤百餘里，廣四十里，土田悉成汙萊，其爲害不亦大乎！」可見胡渭的工作已超出注經家的職責範圍，而是涉及國計民生的問題了。

在釋「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句，不僅考證出恆水即澧水、衛水即溥沱以及二水的流經外，還論證了唐宋以後二水的變遷，如在考釋了古澧水的流經後，則又云：「宋初猶未改。自咸平中，何承與塘泊，以限契丹戎馬之足，於是始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遂空。其後澧水仍自蠡縣改流，經肅寧、河間、雄縣、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復北行。明時則又自雄縣改流入霸州保定界，爲玉帶河，不復入文安矣，此恆水下流變徙之大略也。」同樣地，在據元和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考釋了古溥沱河流經後，又云：「宋初猶未改，自塘泊既興，引水歸北，而文安之瀆堙廢。遂以樂成（今獻縣）之溥沱別水爲溥沱」

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復問，明天啓後，漸徙而南，至本朝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自東鹿決入冀州，與漳水渾濤，而安平、饒陽之地，不復有滹沱矣，滹沱在河北羣川中，溢決尤甚，未有數年不變者，而從冀州合於漳水，亦猶黃河之與淮河，均爲古今水道之極變也。我們今天研究華北平原水系的歷史演變時，同樣也發現宋初修築塘泊是一樁十分關鍵的事件，它對河北水系變化有着很大影響。胡渭的觀點與我們研究的結論是一致的。

在釋徐州「大野既漚」句，胡渭除指出大（巨）野澤所在外，還指出自漢武帝元光三年（前一三二年）河決瓠子、注巨野、通淮、泗後，五代宋金時期黃河又多次決入巨野澤，「凡四五變，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河又決入此地，巨野、嘉祥、汶上、任城等縣，皆罹水患。及河南徙，澤遂涸爲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他的觀點與近年來對黃淮海平原湖泊變遷研究的結論基本吻合。或以爲大野澤即元代以後的南旺湖，胡渭指出「南旺地特高，號爲水脊，賴有閘以節其流，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矣。澤體洿下能鍾水，似不應爾。」所以巨野澤地望「在南旺之西，雖相去不遠，而湖之不得卽爲澤也，明矣。」真是一語中的。

揚州「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中的「三江」，歷來語說紛紜，難定一是。胡渭主蘇軾說以漢江爲北江、贛江爲南江、岷江爲中江，未必符合禹貢「三江」之意，因爲此三江與震澤（太湖）無涉。胡渭爲了支持自己的觀點，提出了長江洪水橫流之際，由蕪湖、高淳、宜興間的胥溪運河洩入太湖的說法。於是對胥溪運河和東壩的興衰作了詳細的記述，尤其對太湖流域水利盛衰和吳淞江壅廢的原由和後

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顯然已非以注經爲限，而是對東南地區歷史地理問題研究了。此外，在釋「沿于江、淮，達於淮、泗」句，詳細論述了江淮之間運河的變遷；在釋「東至于底柱」句，專門討論了三門峽河段爲自漢武帝以來漕運的難題，和漢唐北宋時期如何對三门峡河段進行整治的歷史，無疑這些屬於歷史交通地理研究的範疇。

四、對歷代各地區產業和經濟開發的研究。禹貢各州的貢物反映了戰國時期各地的產業，以往經學家主要着眼于名物的考證，而胡渭則更進一步詳述禹貢時代和以後各歷史時期該物產在本州和其他各州的生產情況及其變遷。如兗州「桑土既蠶」句，胡渭引用歷代注疏、史書及宋明人文集，證明兗州爲歷代蠶桑主要產地，並云「觀秦氏蠶書及濮州舊志所言，則近世猶未之改，不知何時稍衰，而吳越之間獨擅其名，賦歛亦因以加重，遂有朽柚其空之嘆，古今事類不同有如此者。」反映了黃河下游蠶桑事業由盛轉衰的歷史變遷。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句後，引用史記貨殖列傳，唐李肇國史補、太平寰宇記等資料證明從戰國至唐宋在古豫州境內的陳（今河南淮陽）、陽夏（今太康）、襄州（今湖北襄樊市）、宋州（今河南商丘）等地都曾以產漆著稱。紵麻產地的歷史變遷也曾引起他很大的關注。他指出古代豫州是紵麻的重要產地，但在唐通典中記載貢紵布的都在長江中下游荆、揚二州之地，「此古今風土之變也。」苧麻是喜溫作物，唐代後期紵麻種植地域的南移，很可能與當時氣候有一度由暖轉寒有關，十三世紀初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有出現暖期，故元初農桑輯要（一二七三年）卷二云：「苧麻本南方之物，……近歲以來，苧麻藝于河南。」胡渭雖然沒有點出變化的原因

是氣候，但他提出「風土之變」的問題，也是很有價值的。他在「厥篚織纘」句後，引用漢書地理志、左思魏都賦、陳留風俗記、任昉述異記等資料證明歸德府（治今河南商丘）是古代（黃河流域）絲織刺繡製品的中心。另外在青州「厥篚繫絲」句下引漢書地理志載齊有三服官，俗工於織，能「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說明在戰國秦漢時代齊地爲黃河下游地區另一絲織業中心。此外，對南方諸地的礦冶業也多有論述。如在揚州「厥貢惟金三品」下，將江西、浙江、安徽三省的產金地，江西的產銀地和安徽的銅礦以及金、銀、銅三種貨幣的兌值和流通都有詳細的介紹。類似例子很多，不能備列。

禹貢各州田、賦等級，是各州土壤狀況和經濟開發程度的反映。揚州「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反映當時揚州地勢低下，田多沼澤，土濕如泥，土壤爲黏質濕土，故田列爲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爲第六等。這是因爲當時揚州開發不充分，故其田等最低，賦也不高。兩晉以後，揚州地區逐漸得到開發，尤其是唐宋時期大量水田的開闢，使東南地區成爲全國經濟重心所在，國家賦稅所出。爲了增加糧食生產，太湖流域圍湖造田，蔚爲風氣，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胡渭對五代兩宋以來，蘇、松、常、嘉、湖五府地區的圍湖造田之害，吳淞江淤塞的原由，均有詳細的論述，並引用宋、明人對東南水災日甚，田賦日增現象的議論，表示深有同感。其云：「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溺於水者，禹從而拯之，使登於衽席；溺於賦者，日朘月削，如水益深，數百年於此矣，而卒未有拯之者。有能惻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爲之曠然壹變其法，使水復底定之迹，而賦不失壤之規，

斯真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這正與當時許多學者對太湖流域水患日甚，賦稅日重的不合理現象的抨擊一樣，是對時政的批評，顯然其主旨已非限于注經，而是借題發揮他對當時太湖流域賦稅過重現象的意見。

雍州「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胡渭對雍州田列第一等而賦第六等的現象作了解釋，他先引用了詩經中「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周原膺膺，萇茶如飴」；「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等句，又列出史記貨殖列傳所言「自濟、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東方朔傳「豐、鎬之間號土膏，賈畝一金」等記載，證明關中地區確爲沃野。但他又強調指出「然則雍地雖大，其中邦之限，禹所則壤以成賦者，不過方千里。其間又有高山長谷，可以爲田者少，不若冀之平原曠野，一望皆良田，又則壤之地居多，卽令雍他日人功益修，亦未能及冀賦之第一。」他的這種分析是符合實際的。新唐書食貨志三也曾說：「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由此亦可推見，先秦時期雍州區域內經過整治的土地，不過是渭河平原部分，其餘廣大地區尙未或初作開墾，故而總的說來賦的標準不能很高。

由此可見，胡渭對禹貢九州田賦等級、貢物品種的注釋，不限于名物的考訂，而是着眼于歷史時期產業分布的變化和區域開發的研究。這就將禹貢作爲一部古代區域地理的著作的內容發揮得淋漓盡致了。